

● 换个角度想，不必把课标看做语文教学的不二规范，最好把它看做一种指引，看做一种提倡。在它指引下，语文教材编纂者、语文教师去创造性地工作就是了。

培养现代语文能力，过好现代语文生活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访谈

□ 本刊记者 郑浩 李节

了解语言国情，做好语文教育和文化传承

记者：提起语言国情，很多人并不是十分清楚。您是语言学家，同时又是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我国的语言国情是怎样的，语文教师了解语言国情的意义是什么。

李宇明：语言国情包括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两个主要方面。我国现在的语言政策可以概括为：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加快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同时，也要重视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重视公民语言权利的维护。我在2008年度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国家语委的三项职责：

1.从语言文字角度保证国家信息畅通，支持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保障国家在信息领域里的各种权益。这是信息化给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当然，信息畅通（包括政令畅通、军令畅通等）需要很多条件来保证，但是语言文字的保证很重要，因为人类信息80%是靠语言文字传递的。

2.保证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其他中华语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表达思想的权利。当前最重要的是保障中国公民的母语权利，比如在中国领土召开的有中国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国家通用语言应成为会议语言（或会议语言之一）；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应当有

国家通用文字的标志及说明书；电信查询应首先提供普通话服务；中国的各种便民设施用字，应优先使用国家通用文字。民族自治地方，应执行国家的有关法规。

3.帮助全世界愿意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字的人，方便地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字。国家语委除了在自己国土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助少数民族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信息化，还有帮助愿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他国公民的义务，这里包括海外华人，也包括非华人。而且中国语言文字不仅仅是汉语汉字，还有藏语文、蒙语文、维吾尔语文等。中国语言走向世界，不仅仅是汉语汉字走向世界，也是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走向世界。换句话说，中国也应掌握民族语言国际教育的话语权！

语言政策是针对语言生活状况制定的。当前我们对语言生活状况了解得并不全面真切，这是需要加强的环节。从宏观上看，应该从这几个角度去把握：

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字。汉语和汉字虽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但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2.中国走向世界。与此相应，中华语言也在走向世界，外语学习也更加热火。中国是外语学习大国，英语是主要语种，但“小语种”现在也很火爆。

3.信息化。信息化并不完全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它催生了很多新的理念和新的生活方式，形成

一些新词汇、新文化。比如网络已经发展成为当今非常重要的新媒体，对待新媒体中的语言现象，心态要宽容，尽力帮助它走向完善。

4. 重视文化。从文化传承看语文教育，就需要妥善处理简体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问题、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世界有多大，语文就有多大；人生有多长，语文就有多长。”我们不能让语文教师和语文课背上太沉重的包袱，语文能力的提高要靠人生知识的积累和人生体验的增加。

为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国家语委近年来成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研究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和教育等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每年向社会发布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最近正筹建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研究中心。如果对语言国情不了解，对现代语言生活不了解，就会影响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也会影响语文教学。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语言国情，的确需要我们对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但就语文学科来说，也有一个实际情况，那就是关于什么叫语文的问题。通常的定义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嘴里说的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请问，您怎么看待语文教学中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李宇明：要界定口语和书面语有一定难度。书面语和口语的划分，首先应该是从载体开始的：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是口头语言，以文字为载体的是书面语言。但是，也可以从语体风格上定义它：口语风格的可以诉诸文字，如用文字记录的民谣；说出来的话也可以具有书面语风格，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有了文字才产生了书面语。我国许多民族至今也没有文字，他们只有口语而没有民族的书面语。历史上，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曾经严重脱节。大约在汉代，口语同书面语就很不一致了，前人的著作要做“注”才能读懂。到了后来连前人的“注”也读不懂了，对“注”还要注释，称为“疏”。语文现代化从清朝末年起步，当时就提出要“言文一致”。认真说起来，言文一致是相对的，口语和书面语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距离太远，甚至于成为两套语言系统，这势必影响语文教育，影响人的思维，而且书面语会慢慢枯竭，因为它不能

方便地从口语中汲取营养。反之，两者也不能没一点距离。口语是即时性的，说话时难以仔细推敲，难免出现重复啰唆、文意跳跃性大、首尾照应不周等情况。因此口语不能代替书面语，书面语需要专门学习。

时常听人批评语文课忽视培养口语能力，认为当今时代说话比写作重要。也有人反驳，认为上学就是识字，学习书面语。街头不识字的大妈口语溜着呢，不还是文盲？

口语发展和书面语学习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书面语学习需要以口语为基础。学会读书之前，一般儿童已经基本习得口语，在此基础上才能学习书面语。学了书面语，反过来又能够促进口语的发展，使口语升华到一个新阶段。知识分子的口语不同于文盲的口语，道理就在于此。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书面语，小学阶段要充分利用学生已经获得的口语，之后年龄段还应适当训练一下口语，特别要注意通过书面语来促进口语能力的提高。

从目的上定位语文教育

记者：说到语文教育和语文传承，有观点认为，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这基本上抓住了语文的核心。您从语言学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

李宇明：语文教育多数是母语教育，但也不完全是。我国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没有书面语，学生一入学，语文课学的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相邻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语文教育就不是母语教育。有文字的民族，其语文教育多是双语教育，既学母语，又学普通话。在单一民族国家中，也许可以说语文教育就是母语教育；但在多民族国家中，这种说法有点简单化。如果过于强调语文教育就是母语教育，就需要为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编写课本，培养师资。这不仅一下子做不到，而且也未必符合民族意愿。

当然，语文教育在文化传承和母语延续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教育是文化的命脉、母语的命脉。儿童自幼就通过习得的方式从父母那里掌握了本民族的口语，从而也就掌握了本民族的一些文化。口语习得也是文化传承、母语延续的重要方面。

记者：我想，您更多的是从语言国情这一宏观角度来思考和阐述您的语文教育观的。认为母语学习是语文教育的核心的观点，其实主要是针对基础教育中的语文课程而言的。如果把论题缩小一下，把语文

的含义缩小到目前中小学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课程，而且主要指的是语文新课标覆盖下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您如何定位语文教育？

李宇明：如何定位语文教育，问题很大，也很复杂。我主张从教学目的上给语文教育定位。从目的上看，语文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过好现代语文生活的能力。

语文学界历来存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我觉得这一争论是无解的。别说语文具有人文性，物理、化学等也具有人文性。语文当然具有工具性，数学、逻辑学也具有工具性。老这样争论实在于事无补。

课标是一种指引，教学需要多样化

记者：既然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论是无解的，既然工具性和人文性并不能完美地界定语文课程，高中新课标中为什么仍旧保留这一说法？

李宇明：教育是人类历史上较为保守的一种职业。教育需要发展，需要改革，但不能幻想天天搞教育革命。语文教学必须循序渐进，课标是语文教育的顶层纲领，更需要要在原有基础上“碎步快走”。

世界上本无理想化的东西，包括课标。也许把课标看成“和谐”的产物更合适，它要照顾不同学派和不同办学条件，要考虑人们的接受度和可操作性。比如，西部农村的语文教学同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就很难用同一尺度来衡量、要求。虽然谁都说不清楚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但是去掉这些说法人们可能更糊涂，而且还可能为此引起更大争论。争论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减少些争端、多些探讨和实践，对当前语文教学更有裨益。

记者：您是课标研制组的召集人之一，请问您在课标研制中的观点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课标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

李宇明：批评容易建设难。在局外时充满批判精神，进了门方知任何一点改变都不易。现在我深切地感到，当初课标起草人很不简单。今天参加这项工作，自己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似乎对很多事情失去了判断力。

换个角度想，不必把课标看做语文教学的不二规范，最好把它看做一种指引，看做一种提倡。在它指引下，语文教材编纂者、语文教师去创造性地工作就是了。语文教育有好多层级：课标、教材、教师的教学活动，最后是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国太

大了，文化、教育发展很不平衡，不应该幻想用一个课标来通管天下。如果不考虑各种差异性，不提倡多样性，语文教学无论如何也活跃不起来。

制定课标时，大家不断议论，要给语文减负，给语文教师减负。要让语文教师有教学成就感，要让学生有语文学习的成就感。语文就是语文，不能承担太多使命，不能把什么都堆进语文课里。百年来，语文从国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门学科。百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语文教学是有成绩的，不能简单否定历史。时代在前进，语文生活在变化，在已有语文教学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元素，就相当不错了。

现在，整个社会语文水平是下降还是提高了？从全民的语文水平来看，一定是提高了，文盲少了，能写文章的人多了。新中国的语文教育成绩很大。但是，精英的水平下降了，语文大师少了，文学精品少了，这不能不引起反思。这个问题得两面看，如果没有两面看，把语文教育说得一无是处，并不公允。

培养现代语文能力，过好现代语文生活

记者：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指出，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这句话在理论界曾产生很大争议。有些教师也反映，学生的语文知识基础在弱化和淡化。在语文教育中语文知识应该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您作为语言学家是怎么看的？

李宇明：看待这一问题要首先区分教和学。在教这个层面，教师应该有丰富的语文知识以及将这些知识科学运用于教学的经验。过去，语文知识教育的名声不好，与许多语文教师没有融会贯通的语文知识有关，与没有在教学中科学处理语文知识有关。

在学这个层面，是要通过语文学习提高语文能力。知识并不代表能力，但是知识在能力的形成过程中肯定有作用。没有知识却有很高的能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要研究知识和能力之间的转化关系。能力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直接教授。培养途径大体有二：第一，体验和实践；第二，知识讲解。过去语文教学的问题是把语文知识看得太重，有时甚至成了教学目的、考试目标，忽视或轻视了语文实践和体验。而且语文知识教得太死，揉得太碎，以为教会了语文知识就是培养了语文能力；以为知识教得越系统，学生的语言能力就越强。其实，知识向能力的转化不在于系统不系统，甚至整个语文教学

论语文课程改革的实质

——范式转型的历史视角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潘涌

真正具有深度和创意的课程变革，实质上就是新旧课程范式之间的革命性转换，而并非技术主义的形式化演绎。“范式”(paradigm)这一特定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20世纪60年代所创。在这个古希腊词语中，库恩赋予了科学哲学的新含义：“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向研究者共同体提供的典范性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普遍公认的科学习绩。”^[1]库恩确立了科学理论的进步是通过具有不可通约性的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来实现的这个颇有创意的革命性科学观，换言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新旧范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沟通、交流的断裂，而不存在逻辑上的共同准则（即具有不可通约性）。库恩“范式论”不仅给连续积累的旧科学进步观以致命打击，而且给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后来，作为哲学用语的“范式”演化为某个时代被人们公认的、某个专业领域内的范例或体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具有实质内容的革命性变化，当是显著对立的

新旧范式之间的划时代转换。教育学领域内也是如此。

所谓课程范式，是指一个课程共同体所普遍拥有的课程哲学观与相应的诸种具体课程主张的统一。^[2]两者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内在联系。居于上位的课程哲学观规定了课程共同体的独特的价值取向，而具体课程主张则是在课程哲学观指导下对课程问题的具体认识，决定了课程价值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换言之，在某个课程共同体中，各门学科课程尽管内容不同，但都建立在同一教育哲学观和课程观基础上，从课程目标制定、课程计划实施直至课程终端评价，具有若干共性特征，从而适应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

汉语文课程就是这种转型中的课程范式样本。语文课改的实质就是范式转型，即从指令型课程向创生型课程的范式转型。百年来，在以杜威为代表的儿童中心主义、前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后现代主义教育观等外国重要教育思潮的影响下，语文学

都不需要系统，因为教材、课堂只是学习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场合，课外的学习与经历不可或缺。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帮助者、引路人，学习的帮助者还有同伴、父母、社会等。教师应该当好学生的导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不能恰当表达当今教师的职责。

语文知识也是公民素质之一。语文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育，重点是培养学生适应现代语文生活的能力，而且也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语文知识，正像人要有一定的卫生常识、历史常识一样。

语文教学必须教语文知识，淡化语文知识肯定有害。关键是：第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教什么样的语文知识，以使其有效内化为语言能力。第二，传授公民应有的语文常识。

记者：那么应当如何理解现代语文生活的含义呢？

李宇明：我们对现代语文生活了解得还不是很

清楚，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总结。以己愚见，它起码有五个必须考虑的特点：

第一，信息化时代。现在是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观念瞬息即生。信息的快速接收、检索与加工，成为语文教学的新任务，或者说阅读在“听、说、读、写”中的地位更突出。信息时代出现了很多新词语，甚至是字母词语、网络上的特殊词语，学生过好现代语文生活，就需要了解它，需要客观对待它。

第二，亲近文化，亲近经典。曾几何时，我们把中国文化看做进步的包袱，弃之怕不彻底。而如今认识到，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人一生大约都会问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第一个问题是认同问题：文化认同、母语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认同本质上是个人文化归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出身、问历史。我们从悠久的中华历史中走来，从孔孟那儿走来，从唐

科曾出现过儿童经验型、教师指令型、师生创生型等多种课程范式。每一种课程范式的诞生，都以一定的教育哲学思想为背景，并有自己的实践主张，从而对课堂教学创造力产生了或禁锢或释放的显著影响。本文侧重于梳理外国教育思潮影响下语文学科从指令型课程范式到创生型课程范式的历史转换过程，分析这种课程范式转换对当前和未来语文教学创造力的解放所产生的重大促进作用。

一、语文指令型课程的形成和后果

1904年1月13日（农历癸卯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等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的《学务纲要》从教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教学标准诸方面明确规定了以后作为国文科先声的“中国文学”的设立，从而标志着注重实用、发展语言能力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奏定学堂章程》作为“博考外国，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3〕}的历史产物，主要以欧美近代教育为真正源头，形式上是从日本引进的学校制度和课程设置，这样自然初步体现出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萌芽。五四以后，在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初步具有民主及科学特色的崭新的现代课程范式，体现出告别读经时代以后，以学生个人发展为本位的新价值取向。在教学内容上，教材突出充满新时代生命气息的语体文，使之尽可能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融成一体；在教学方法上，反对传统的灌输法，倡导学生学习的

自动性和自主性，尊重并怡养其读写趣味；在发展目标上，关注从文言文向语体文（白话文）转型过程中学生现代语文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关注其思维和心智的提升、情感和德性的涵养。

1949年以后，伴随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包括语文在内的课程范式也发生了新的转折。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明确指出：要“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4〕}这一方针明确限定了包括语文课程在内的整个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突出了语文课程与教学发展以前苏联为借鉴对象的基本特点。此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极端“左倾”化，语文课程与教学自然难免被“苏化”的时代思潮所裹挟而逐渐丧失自我。

作为前苏联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凯洛夫教育学说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宏观方面，他过度强调教育的阶级性，认为教育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用来巩固自身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建设者。具体到教学实践，他要求“在学校的一切教学工作中，绝对保证教师的领导作用”，视教师为“教学中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教师单向的讲授“起主导作用”；认为教科书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源泉之一”，教科书内容只能选择确定不移、颠扑不破的原理，而不是在科学上尚无

诗词那儿走来。第三个问题是人生路向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生价值观问题，是由前两个问题决定的。语文教学要通过自己的学科优势帮助学生回答这三个问题。

第三，虚拟世界。虚拟世界是现代语文生活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让下一代过好虚拟世界的语文生活，不容忽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会有新观点。比如汉语拼音，它不仅是注音识字的工具，而且是人与计算机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过好现代语文生活的重要保障。语文减负常有人提出要减汉语拼音，若从虚拟世界的角度看，汉语拼音教学反而应该加强。

第四，了解语言国情。多数人不了解语言国情，原因之一是语文教育里缺乏这方面内容。语文课有义务帮助学生了解中国语言文字基本状况，培养对母语和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帮助学生正确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民族语言之间的关

系、母语与外语的关系。

第五，面向世界。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需要培养学生具有世界意识。世界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世界。要帮助汉语等中华语言走向国门，也要学好外语。语文教学既要有本土意识，又要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让学生将来有走向世界的的能力，用世界熟悉的话语方式同世界交流。

了解这些问题，也许对语文教学并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于处理一些语文争论，把握语文教学发展的方向，促进语文教学与时代的结合，应当有启发。

记者：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我国语言国情的高度审视语文教育和语文传承，从教学目的的角度来定位中小学语文教育，提出了现代语文生活的概念，相信您的观点会给我们的读者带来知识、启发和思考。

培养现代语文能力,过好现代语文生活——国家语委副主任、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访谈

作者: [郑浩](#), [李节](#)
作者单位:
刊名: [语文建设](#) 
英文刊名: [LANGUAGE PLANNING](#)
年,卷(期): 2008(5)
被引用次数: 1次

本文读者也读过(8条)

1. [叶花](#) [李宇明教授应邀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作学术报告](#) [期刊论文]-[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1)
2.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稿约](#) [期刊论文]-[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2010(10)
3. [陈前瑞](#) [呵护语言的家园——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评议](#) [期刊论文]-[修辞学习](#)2006(2)
4. [张伟](#) [语言文字:信息化时代的国家“硬实力”——专访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 [期刊论文]-[中国经济周刊](#)2009(31)
5. [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期刊论文]-[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2007(9)
6. [蔡可](#) [语文教育与现代公民的语文能力——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访谈](#) [期刊论文]-[中学语文教学](#)2010(1)
7. [王笑艳](#). [蔡长虹](#). [张洋](#) [新闻发言人的语言问题——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访谈录](#) [期刊论文]-[新闻爱好者\(下半月\)](#) 2010(8)
8. [李宇明](#) [公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资源——序《母语·文章·教育》](#) [期刊论文]-[中国大学教学](#)2009(2)

引证文献(1条)

1. [李永](#) [元语言理论视野下的汉语语文教学](#) [期刊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10)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wjs200805002.aspx